

20
评

伯恩施坦的哲学思想

PING BOENSHITAN DE ZHEXUE SIXIANG



评伯恩施坦的哲学思想

李家钟 张国钧 张 伟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毅辉
封面装帧 甘晓培

评伯恩施坦的哲学思想

李家钟 张国钧 张 伟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 67,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200

书号 2074·382 定价: (六) 0.29 元

序 言

伯恩施坦有庞杂的哲学思想，这是他拼凑和推行修正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国际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梅林，还有普列汉诺夫等人，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批判过他的哲学思想。伟大的列宁更是高度重视从哲学上清算修正主义。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着重批判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为其政治主张和政治路线作论证的一些哲学观点，按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的顺序加以展开；在末章，对概括地表现了他的理论和行动特点的修正主义公式，作了剖析。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历史背景、社会作用和他的活动，我们写了关于他的一生简介。

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目 录

序言

伯恩施坦一生简介	1
一 早期的生涯	1
二 修正主义体系的形成	6
三 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活动	14

第一章 源于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路线

一 “回到康德去!”	19
二 意识力量所及的客观对象“已经不是纯粹物质的东西”	22
三 存在着天才的“先知”	27
四 不可知论“是一个普遍的思想方式”	30
五 哲学、社会科学“不需要特殊的党的倾向作为基础”	34

第二章 庸俗进化的发展观

一 矛盾只存在于“概念之内”	40
二 发展是“相似的力量的合作”	45
三 发展只是“现存事物的改组”	50
四 折衷主义是“清醒的理智”	54

第三章 观念是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历史观

一 观念是历史发展的“正当原动力”	58
二 人的意志能“摆脱必然性的影响”而自由	63
三 伦理原则“创造”社会主义	69

第四章 以意志为基础的非阶级的国家观	74
一 国家是实现“共同意志的社会组织”	74
二 “有了平等的普选权”的国家便是“人民国家”	77
三 “用不着炸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	81
四 消费者反对生产者的斗争是“阶级斗争”	86
第五章 一个实用主义的公式	90
一 公式的形成过程和政治实质	90
二 公式的哲学根据	94
三 公式的实用主义性质	97
四 马克思主义者对公式的批判	101

伯恩施坦一生简介

一讲修正主义，人们便往往提到德国人爱德华·伯恩施坦。不少人认为他是修正主义的始祖。列宁的看法不同。一九一四年，当俄国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分子弗·列维茨基称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始祖”的时候，列宁立即作了反驳，指出“伯恩施坦不是始祖。”^①伯恩施坦也再三否认自己是修正主义的创始人。然而，他毕竟是把修正主义观点形成理论体系并加以全面推行的第一个代表。所以，列宁又指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的第一个修正主义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②。伯恩施坦自己则说：“人们谈到我时，不是把我当作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当作‘大修正主义者’”^③。

伯恩施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一 早期的生涯

伯恩施坦，一八五〇年一月六日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

① 《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3页。

②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2页。

③ 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以下简称《自传》）。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8页。

血统的家庭，父亲原是白铁匠，后来当火车司机。一八六六年，他中学没有毕业就进柏林古滕塔兄弟银行当学徒。四年学徒期满后，于一八七一年春天转入魏玛一家银行在柏林的分行当职员，同年夏再转入路特希尔德银行当职员，一直干到一八七八年。

在青年时期，伯恩施坦受到资产阶级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一八七一年，普鲁士赢得了普法战争，乘势统一了德国。普鲁士政府对坚持革命立场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①领袖奥·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进行迫害。这时，伯恩施坦对工人运动并不关心，他自述连巴黎公社也“很少知道它的消息”。主要由于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受迫害表示同情，钦佩他们的英勇精神，他才开始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些活动，并于一八七二年四月加入了党，宣称信仰社会主义。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他所信仰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拉萨尔和杜林的社会主义^②。

伯恩施坦入党不久，被党的领导成员奥艾尔当作鼓动家“发掘”出来，担任了党的宣传鼓动员。他无视拉萨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要党放弃原则向拉萨尔派妥协。接着，他作为党的代表之一，在一八七四年十月到次年上半年

①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曾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民主党，为求简便，以下统称德国社会民主党。

② 拉萨尔(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曾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对抗马克思主义。

杜林(1833—1921)柏林大学讲师，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伯恩施坦曾参加过以他为首的反党的小集团。

参加了同拉萨尔派谈判合并的委员会。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的《哥达纲领》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产物。后来，他基本承袭了拉萨尔的政治观点，并颂扬拉萨尔是“导师”，是“闪烁着真正的金光的明星”，主张复活“拉萨尔留给工人阶级的丰富的精神遗产”^①。同时，他还是在七十年代颇为“激进”的杜林主义的信徒，杜林小集团的骨干。他伙同莫斯特和费里切利用担任宣传工作的条件，宣扬杜林主义，加深了党内的思想混乱。杜林的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来源之一。

一八七八年五月，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出了《镇压德国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并于十月颁布实施。德国国内白色恐怖骤然加剧，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了摧残，并一度陷入混乱。伯恩施坦于当年夏季辞去银行职务，经施拉姆介绍给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伯格当私人秘书。他们三人聚集在瑞士的苏黎世，办刊物、写文章，鼓吹改良主义，形成了“苏黎世三人团”。伯恩施坦甚至不惜为俾斯麦的高压政策张目；从一八七九年三月起就“责罚”党的“不循规蹈矩的举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政策，逐渐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一八七九年七月，党在莱比锡新成立的领导机构指定伯恩施坦等三人在苏黎世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即将在那里创办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筹备工作和财务管理，可是他们三人竟自封为党报的

^① 《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10、309页。

编辑委员会。同月，在赫希伯格办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一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就是“三人团”的标记）。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歪曲历史，诬蔑参加过一八四八年民主革命的老一辈革命者是“爱好街垒战的无赖”。他们提出的“箴言”是：党不应成为“片面”的工人党，而应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无产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党要“反省”、“忏悔”，放弃阶级斗争，坚持阶级合作，再不要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党要抛掉最终目的，只追求眼前的点滴改良，“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甚至认为《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是党以“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根鞭子”^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读了这篇文章后十分愤慨，于当年九月联名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指出这篇文章是“三人团”的宣言和纲领，批判了他们鼓吹的投降主义和改良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斥责了他们糟蹋党和党的理论的行为，指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党内的“冒牌货”，严正宣告决不能和坚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一道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如倍倍尔，也谴责了这篇文章，指出它是“头等的腐儒作品”，只是对俾斯麦“反对我们的态度表示十分满意”^②。受到批判以后，伯恩施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在党报从事报道德国社会

① 转引自《〈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译者序》，第3页。

② 倍倍尔：《我的--生》第3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0页。

民主党反对《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斗争的工作中，颇为积极，表现了“迥然不同于……三星文章所流露的情绪”^①。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福尔马尔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职务，倍倍尔决定由伯恩施坦接任。为了改变伯恩施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印象，倍倍尔还带他到伦敦去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称此行是“伦敦卡诺莎之行”，意即认错之行^②。当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会见了他们俩，历时八天，交换意见。伯恩施坦解释说，那篇三星文章不是他写的，他只是在赫希伯格的催促下写了二十多行字；同时保证今后服从领导，执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从一八八一年一月起，他担任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代理主编，一年后正式任主编，直到一八九〇年该报停刊为止。在此以后，他还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驻伦敦记者和理论杂志《新时代》的常任撰稿人。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广阔发展的欧洲工人运动中起了良好的作用，影响颇大。伯恩施坦在其中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因而赢得了理论家和“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倍倍尔认为，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伯恩施坦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可是，伯恩施坦这时仍然不时暴露出一些错误观点，尤其从一八八八年他随该报迁往伦敦以后，不顾恩格斯的一再告诫，常同英国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的

① 倍倍尔：《我的一生》第3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34页。

② 卡诺莎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山中，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同教皇抗衡失败，在1077年到卡诺莎向教皇悔罪，并表示臣服。从此，有人把当面认错和表示服从的行为比喻为“卡诺莎之行”。

头子厮混在一起，以他们作榜样，并自称向他们“学到了一些东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此后，他在新的条件下发挥了原有的机会主义的思想，终于蜕变成了修正主义者。

二 修正主义体系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逐渐形成，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体系亦随之形成。

九十年代的头五年，伯恩施坦开始酝酿自己的修正主义。这个时期，他为疾速膨胀着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时繁荣所折服，又实际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德国的舒尔采—格弗尼茨等人的影响，发展了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改变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论断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继续增长，革命信念终于根本动摇。一八九〇年初，《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被迫取消，铁血宰相俾斯麦下台，新组成的卡普里维政府改变统治策略，推行所谓自由主义的新方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竞选中取得重大进展，获得了近一百五十万张选票。伯恩施坦对资产阶级民主充满幻想，为党在竞选中的重大进展所陶醉，极力渲染一百多万张选票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提出了“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①的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组织负责人福尔马尔于同年六月和七月，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的演说中，把这种主张讲得更加明确，

^① 《伯恩施坦言论》，第6页。

认为《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的取消和政府策略的改变，是统治阶级“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党应当“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摒弃暴力革命，力行改良主义，断言“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①。当时，这类观点在第二国际的许多党内滋长蔓延。德国社会民主党不顾恩格斯的再三警告，对竭力鼓吹这类观点的福尔马尔采取调和态度，更助长了伯恩施坦的气焰。伯恩施坦在一八九三年二月发表文章，评论英国医生哈弗洛克·艾利斯的《卫生事业的国有化》一书，盛赞该书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目前的社会本身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发展着那些合在一起有朝一日将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的经济因素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因素，这一点是绝对不容否认的”^②。这实际上是“绝对不容否认”地表明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又发展了一步。

恩格斯敏锐地觉察了伯恩施坦思想的蜕变，为了继续教育和挽救他，在一八九三年再次鞭挞了费边社的改良主义，并于十月指名批评了伯恩施坦，说“他还不是他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他总是喜欢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越来越象他那个在《人民报》的绝顶聪明的伯父”^③。他伯父阿伦·伯恩施坦是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当时德国的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恩格斯的批评深刻揭露了他

① 转引自北京大学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68页。

② 《伯恩施坦言论》，第14页。

③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3年10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0页。

的机会主义观点的阶级实质。伯恩施坦不仅拒绝接受恩格斯的教诲，而且在一八九四年进一步明确表示反对恩格斯阐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思想路线的根本点上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伯恩施坦把自己的分散的观点加以串连补缀，形成了体系。一八九五年八月恩格斯逝世后，他立即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修正”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八九六年先以评论《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史》一书的形式，贬责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布朗基是“恐怖主义者”，影射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接着，从十月起，他以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作阵地，用“个人的观点和传统的观点”作副标题，在《社会主义问题》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赞扬垄断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经济危机，认为没有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划一条界限，强调随着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阶级斗争将越来越缓和；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反对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甚至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他在哲学上提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号，用新康德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篡改历史唯物主义，鼓吹观念的力量是历史发展的“正当原动力”。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竭力论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

当时，许多党员强烈反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公式，迫使考茨基没有敢把他的文章全部发表完。有的党员要求把

伯恩施坦的问题提交于一八九八年十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态度含糊,没有把他的问题列入专题议程。伯恩施坦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法,在这次代表大会前夕,从伦敦写了致党代大会的信,宣称:“一个会议不管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它的裁决总不能使我对于自己的通过考察社会现象而获得的见解产生疑惑”^①。倍倍尔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信后声明:“我并不站在伯恩施坦的立场上,在主要问题方面我是反对他的”。^②威廉·李卜克内西指出伯恩施坦是被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慑服了,还说:“如果伯恩施坦的议论是对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埋葬自己的纲领和一切自己的过去,那时候我们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③克拉拉·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更加猛烈地抨击了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强调夺取政权始终是党的最终目的。奥艾尔、福尔马尔等人在大会上发言支持伯恩施坦。考茨基在发言中,替自己同意发表伯恩施坦的文章辩解,并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而是使得我们思考。为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他。”^④这次大会虽然揭开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序幕,但并没有就这问题作出结论。代表大会后,伯恩施坦在十月二十日又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要沿着修正主义方向走下去,同时宣布接受考茨基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头子阿德勒的“一再敦促和劝告”,把自己的观点在一本著作中作一

①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一版序》,第1页。

② 转引自《〈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评者序》,第3页。

③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32页。

④ 同上书,第25页。

个系统地概述。这本著作就是他在1899年一月写成、当年夏季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下简称《前提和任务》)。这本书是他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著作,又是他自己的历史发展中的根本性的蜕变。倍倍尔说得好,这些情况表明他已完成了最后一次脱毛。这也是他的修正主义体系形成的标志。列宁指出,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有特出的政治意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的宣言。”^①伯恩斯坦自己也说,从此党内的机会主义者都把他当作靠山。他成了公认的大修正主义者。

《前提和任务》共五章,二十来万字。第一、二章主要讲哲学,用主观唯心主义攻击科学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着力篡改历史唯物主义,歪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实践。第三章侧重讲政治经济学。他特别坚持柏姆—巴维克的“边际效用论”^②,诬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剩余价值论是“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③;他根据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故意掩盖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及其矛盾,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灭亡规律的学说。在第四章中,他竭力鼓吹以阶级合作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以“和平长入”

① 《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43页。

② 柏姆—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认为商品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商品的效用性和稀少性,实际上是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供求关系说明商品的价值。

③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89页。为简便,以下称《前提和任务》。

为核心的改良主义观点，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理，诽谤无产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①。在末章，伯恩施坦本着新康德主义的精神，论证了修正主义公式，对批判过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扑，顽固表示要“十分苛刻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任”^②。

《前提和任务》迅即被译成英、法、俄、日、瑞典、捷克和保加利亚等文字发行，不仅在资产阶级阵营里受到称赞，而且得到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的尊奉。法国社会民主党头子米勒兰把他的政治策略付诸行动，参加反动政府，破坏工人运动，成了“实行这种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的绝好的榜样”^③。修正主义国际化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在第二国际范围内开展起来了。各国党的左派从各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双方在第二国际一九〇〇年举行的巴黎代表大会上进行了交锋。左派抨击了米勒兰的叛变行径；伯恩施坦代表的右派则认为米勒兰的入阁是执掌政权的重大步骤；考茨基采取中派立场，在他提出的决议案中，承认米勒兰的入阁不是取得政权的一般原则，而仅仅只是策略问题。巴黎大会通过了这个“橡皮决议”。第二国际从此逐步分裂成了左、中、右三派，并渐渐地在修正主义蛀蚀下破产了。伯恩施坦从此就更加积极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进行活动，采取各种手段贯彻自己

① 《前提和任务》，第 195 页。

② 同上书，第 265 页。

③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26 页。